

到二五〇一次日本军事临时列车上，军临车起火烧毁四辆，倒翻十几辆，弓起六、七辆。乘这列车的是刚从太平洋南线上换防下来的一个旅，全部日本军官五十多人，仅剩下两个活的。日军的大佐旅团长只剩下一口金牙和一只靴子。四十多匹马，几百只短枪和子弹，三个车皮的被服和口粮，都在黑岗站报销了，损失极为惨重。日本关东军司令闻讯后，异常惊恐，专门派一个少将到昂昂溪来处理善后。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传诵着为这件事而光荣牺牲的共产党员、优秀铁路工人——站长、扳道员、军临车长等人的英雄事迹。

工人群众的抗日斗争，除了组织义勇军、公开进行武装反抗外，在党的领导下，还极其隐蔽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最常见的是从事破坏生产的各种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 二、东北抗日联军

### 1 磐石、珠河等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工作的不少负责同志受错误路线影响，不会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一仍过去那些老办法，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街头讲演，散发传单，以至于准备在哈尔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召集七次都没开起来。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以“伍豪”笔名写的文章《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认真贯彻这一精神，一方面动员大

批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中做工作，一方面指示各地党组织创造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红色抗日游击队。

在一九三三年前后，共产党对那些以东北军为基础的抗日义勇军所进行的争取、改造工作，虽然效果不大，却从这一阶段工作中获得了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并产生了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人民武装，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逐渐提高了。不过仍还有左倾路线的干扰，当时有所谓“反对北方落后论”的主张，提出要一律“创造苏维埃红军”的过“左”口号，压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障碍了抗日游击队的发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地方党组织发出一封指示信，指出：“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便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彻底革命的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它，并且只有它，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的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sup>①</sup>在中共中央指示信之前不久，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以朱德同志为首的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在下列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

<sup>①</sup>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

与领土完整。”<sup>①</sup>这一宣言最早也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对国民党要求抗日的官兵起了鼓舞作用。在这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蔡廷锴等部反蒋抗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件，这些对满洲省委按照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很大。

当时，东北的形势正是以东北军余部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斗争日趋瓦解，日军进犯热河、控制长城线、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缔结《塘沽协定》的时候，失败主义的情绪正笼罩着东北。中央指示信精神的传达，重又增强了人们反日的信心。满洲省委迅速做出决定，号召与督促东北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加强扩大各地人民游击队的同时，对遭受日伪打击溃散后的各种抗日武装积极进行收编和整顿，以挽回东北抗日运动消沉和混乱的局势。例如，一九三三年初，救国军、自卫军大部崩溃之后，散在吉林东部和辽吉边区的残部不下五万人。共产党这时候掌握了救国军的领导，以周保中、胡泽民、王毓民组成党委，重整残部，分编为六路，建立了“辽吉边区”根据地，又在牡丹江一带进行大小无数次战斗，威胁着中东铁路东线地区。

在辽南一带，共产党所领导的磐石人民革命军分遣部队，开辟新区，扩大活动到通化及安奉铁路沿线，团结和带动了那个地区的王凤阁部队以及辽宁自卫军的残部及邓铁梅、苗克秀的残部约七、八千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自此，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游击战争的发展与高潮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队占据广大农村地区，向日伪占领的中心城市、铁路沿线据点，开展不断的袭击，抵抗了敌人的历次“大

<sup>①</sup>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

讨伐”，形成了一九三三年夏到一九三七年间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潮。它的特点，概括起来是，第一，东北军溃散的残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和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行动主张，大体上为他们所接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思想影响不太起决定作用了。共产党着手对他们进行改造和教育，于是，有十余万人左右的抗日武装，开始以新的面貌与组织形式出现了。第二，党直接掌握的人民武装——赤色游击队应运而生，在斗争中更加扩大了，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等比较系统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当时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榜样和核心。第三，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天以来，不仅在游击区的人民群众几乎普遍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直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就在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据点，也都建立起地下“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第四，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实击虚，以少胜多，打得日伪措手不及，只好处处防守，陷于被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主要的有这样几支：

**磐石游击队** 早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共产党就在西玻璃河套一带，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反日会”，一九三二年春，在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爆发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断电线、烧枕木，组织了一个只有七人的小武装——专打汉奸狗腿子的“打狗队”。后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磐石中心县委派孟洁民、楚相臣等同志直接领导，北满特委兵委书记杨佐青同志前来组织指导，“打狗队”很快发展成一支二百多人的工农游击队，由李红光同志任队长。后来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受到挫折。一九三二年底，党派杨靖宇同志到磐石，坚持了党的

领导，加强了队内的政治工作与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制定了军事计划，很快把游击队引上壮大发展的道路。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三个月，粉碎了四次“讨伐”，并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内应下，策动烟筒山伪兵十四团追击炮连全部反正，充实、扩大了力量。一九三三年夏与海龙游击队汇合，在东丰、西丰、海龙、辉南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在斗争中，磐石游击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与争取吉奉铁路沿线最大的反日山林队“殿臣”、“双江”、“老双胜”、“德林”等，不断破坏铁路交通，伏击敌人，致使吉奉铁路曾被断绝达半年之久，吉林、抚顺等日伪统治经常受到威胁，活动范围包括通化、柳河、兴京（新宾）、宽甸、桓仁、濛江、抚松等县。一九三三年秋，在磐石三区石虎沟的军民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军民一致拥护杨靖宇同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以后，这支部队发展成为威震敌胆、鼓舞南满同胞抗日斗志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东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的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延吉、汪清、和龙各县很快都建立了游击队，在各县县委领导下，独立开展武装抗日活动。他们作战勇敢，斗争坚决，用自制的土手榴弹，原始的土枪、土炮打击敌人，有时徒手与日军搏斗。他们努力做群众工作，游击区的妇女、儿童乃至老人都帮助游击队搞侦察、联络、抢救伤员，肃清敌特。一九三三年初，琿春也成立了游击队，活动范围在延边地区的安图、东宁一带。一九三四年春，在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王德泰同志领导下，将游击队扩编，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人数近两千人，师长朱镇，政治委员王德泰。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

**珠河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底，赵尚志同志以同乡关系投到哈

东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后，当了参谋长，做上层工作，珠河县委派李启东等与之配合做下层工作。一九三三年秋天，孙朝阳受日伪奸细政策诱骗而投降，根据该部共产党组织的决定，赵尚志等七人携带一挺轻机枪，七支步枪，脱离了孙朝阳部队。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秘密的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了珠河游击队。这支队伍成立以来以骁勇善战著称，长于袭击，常常出奇制胜，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致使敌伪军一听到珠河游击队和赵尚志的名字时，就谈虎色变。珠河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游击区包括滨江、宾县、方正、延寿、五常、珠河、阿城、双城、榆树、苇河各县，有时进逼到哈尔滨近郊满家店、蜚克图、横山咀子一带，对敌人威胁很大。一九三四年五月初，珠河游击队在赵尚志、李兆麟的带领下，准备第二次攻打滨州县城，自制了土木炮，装了五十多斤火药，几个五、六斤重的大称砣和十几斤的碎铍铁，轰开了敌伪戒备森严的城堡，吓得敌人不知游击队拥有什么新式武器，望风而逃。一九三四年春，以珠河游击队为基础，团结其它队伍，建立具有统战性质的“反日联合军”。同年夏，扩为四百人，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并联合考凤林、北来等队伍，共同宣誓对日作战，最后发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以后它发展成为抗联第三军。

**密山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初，王德林救国军溃散时，保留下来一个由共产党员李延禄掌握的补充团。该团以史忠恒、李凤山、朴根重为代表的约一千余人的精干力量被改编为游击军，李延禄同志任该军司令。后来，这支队伍离开牡丹江地区向密山转移。一九三三年秋到达密山后，和密山县委创建的、由周子歧同志负责的密山游击队相汇合，开始在密山、勃利、宝清、林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八月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绥宁游击队(或宁安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初,在牡丹江地区,中共宁安中心县委组织了绥宁游击队,人数近百人,枪支是“九·一八”事变前夕该地区红色游击队失败后埋藏在穆棱的。这支游击队曾发展到二百余人。由于受日本侵略者与其它匪军的夹攻,部队损失了一半,剩下的转移东满,合并于东满游击队,成为以后抗联第二军的骨干力量。同一年,宁安党组织派张建东等同志做统战工作,掌握了宁安最大的反日山林队“平南洋”(李荆朴部队),进行彻底改造后,改称“工农抗日义务队”。一九三三年初,救国军、自卫军大部溃散,周保中等同志退出救国军领导,重整残部,汇同柴世荣、刘汉兴、王汝起、付显明等人所属各部,与工农义务队一起重新成立吉东抗日同盟军。经过分化、改造抗日同盟军,又改为宁安游击队。一九三四年秋,又把工农义务队扩编为吉东游击大队。后来它们汇合发展成为抗联第五军。

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地下党汤原县委就曾在汤原的西北、西南一带农村中,组织过地下武装和徒手的农民义勇队。“九·一八”事变后,根据省委指示,一九三二年夏积极着手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同年十月组织起人数不多的一支武装,但由于缺乏经验,被土匪“荣好”缴械了。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秋收运动、募捐购械的基础上,着手建立第二次汤原反日游击队,在汤原、萝北、通河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由于缺乏阶级警惕,没有防止被收容的土匪暗中破坏,发生兵变。自此,汤原县委总结两次建军失败的教训,在夏云杰同志的领导下,派出党团员七十多名做骨干,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初,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跨越松江两岸,扩大战果,不断获取胜利。后来联合汤原县义勇军冯志刚部队及张传福部队,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打破了敌人的几次“讨伐”,发展了游击区,活跃于富锦、桦川、依兰一带,成为东北

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前身。

**饶河游击队** 日军侵占东北后，饶河中心县委即着手建立地下武装——农民反日自卫队，但遭到破坏。一九三二年秋，又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六十余人“饶河反日游击队”，公开活动。一九三三年开始，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统一活动，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活动。一九三三年，陈、高所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在李葆满（学福）领导下，越战越强。为了粉碎敌人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把部队变成一支快速飞行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乌苏里江左岸上唯一的一支中坚力量。这支部队以后扩大为抗联第七军。

此外，还有海伦、台辽等游击队在一九三二年以后开展过抗日活动，最终失败了。

以上各支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他们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部队成分好，组织性强，觉悟高，作战英勇。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日会和各种革命团体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使一九三四年四月日伪的“春季大讨伐”不得不宣告失败。而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步发展，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到一九三四年末，逐步形成了联合的趋势，有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打破地域界限的较大的组织形式，各路协同作战，重点破坏敌人铁路交通。据伪满洲国铁路机关的统计，自一九三三年三月至十月，日伪铁路被袭击的回数，总计有六百五十九次，破坏铁道一百零一次，击毙日伪护路军五百四十六名。<sup>①</sup>一九三

<sup>①</sup> 《巴黎救国报》第9期：《东北四省四年来的反日游击战争》。



四年一月至十月间，伪奉天铁路局所辖各路遭到游击队的袭击达一百五十六次，伪长春铁路局所辖各路遭到袭击达一千零五十一一次，伪哈尔滨铁路局所辖各路遭到袭击达一千二百七十一一次，洮昂路遭到的袭击一百六十六次。<sup>①</sup>敌人掩饰不住惶恐的心情惊呼：“土匪破坏交通日见猖獗，近来情形为向所未有，而交通为全国靖绥之命脉，此种情状，实不可再忍。”<sup>②</sup>于是在今年十月，日伪又开始举行“秋季大讨伐”，以通化地区、哈东地区、东满的延边和绥宁地区为重点，出动了六个师团的部分日军及伪满靖安军警备旅三万余人，历时四个月。日伪当局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只是那些领导动摇和组织散漫的山林队和东北军残部等遭受打击与损失，如殿臣、德林、孔宪荣，李三侠、牡丹江八大队等有的投降了，有的逃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等，反而在艰苦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武器精良，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极大活跃。”<sup>③</sup>这就形成了一九三四年东北抗日斗争重新抬头并获得飞跃发展的新形势。对此，伦敦《每日导报》（一九三三年七月）有所披露：“在满洲之关东军谓绥靖‘土匪’已告一段落，可以安心者实属毫无根据。其实义勇军不独未被击破，且未被击散。反之，义勇军却日益使‘满洲国’当局机隍不安。目下整个满洲境内，日人没有绝对安全的一条马路。”

## 2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

一九三四年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

① 李新等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67页。

② 《巴黎救国报》第9期：《东北四省四年来的反日游击战争》。

③ 1935年关东军公报207期，转引自《东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第42—43页。

根据抗日斗争出现的新高潮及人民武装斗争的大发展，为统一各游击队的领导，使其紧密配合，以适应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开始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渐趋联合的队伍中，进行统一建制的组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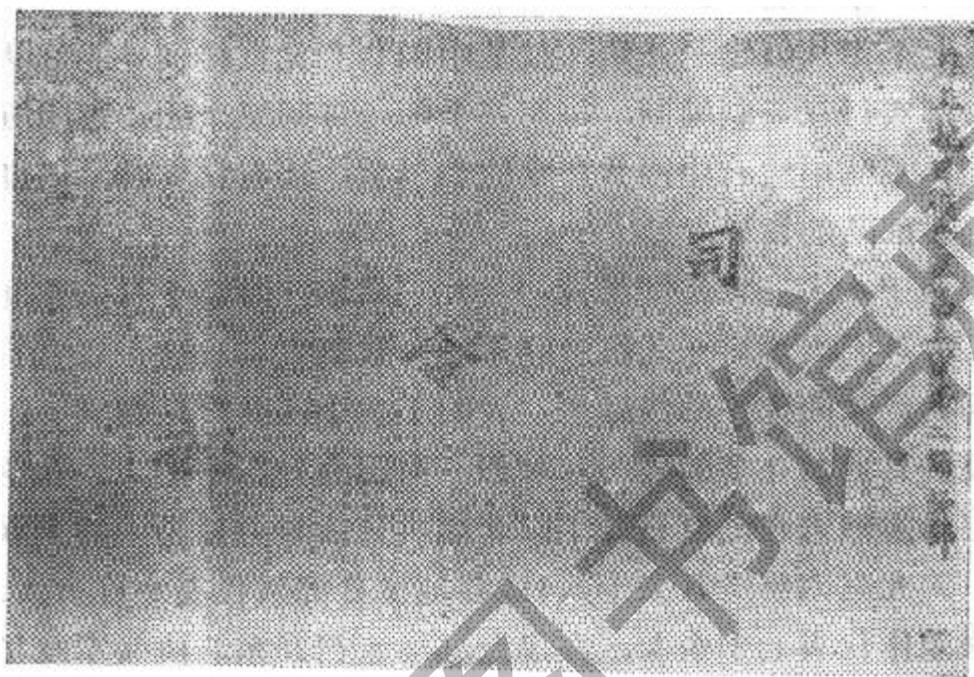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夏天，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党政府履行《塘沽协定》不力，对华北、平津一带施加军事重压，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在北上抗日途中，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主张全民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东北的抗日游击武装力量，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建立起七个军。

南满的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扩编为两个师、一个独立团、一个少年营、一个警卫营，杨靖宇同志仍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基本游击区在吉奉铁路、安奉铁路沿线、整个通化地区与鸭绿江右岸等地，达二十个县，划分五个区。

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为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同志任军长，魏拯民同志任政治委员，分编两个师，基本游击区是中东铁路东线以南，图佳铁路、牡丹江市以南，京图线老爷岭以东到图门江，西部为抚松、濛江、长白、临江、辑安（今集安）等，约二十个县。

哈东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以赵尚志同志任军长，冯仲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初编一个师，后编三个师。基本游击区最初为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左岸十余县，以后转移于绥化、佳木斯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右岸之萝北、佛山、绥滨等，共达三十余县。

李延禄同志领导的游击军与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初编一个师，李延禄同志任军长，黄玉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基本游击区为牡佳铁路两侧及北老爷岭东西地区，宝清、富



抗 联 的 军 旗

锦、密山一带共十余个县。

绥宁游击队与同盟军各部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同志为军长，柴世荣同志为付军长，刘汉兴（陈陇）同志为参谋长，宋一夫为政治部主任，分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基本游击区西南起敦化额穆，沿牡丹江两岸北达依兰，再从方正直达桦川、富锦、宝清中间，扼制“图佳”、“中东”、“林虎”、“穆棱”等铁路。

汤原游击队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同志为军长，张寿箴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下属四个师，每师两个团，基本游击区为汤原县西北和西南六个县区，以及松花江南岸依兰、桦川的双鸭山和太平川一带。

饶河游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李学福为军长，编为两个师，很快又编为三个师。游击活动北达同江、抚远，西到宝

清、富锦，南为虎林、密山。

这七个军从创建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各军大都实行三三制编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五至七个连。军队中建有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还有党支部，保证了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

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这个宣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统一和加强，对国内外影响很大。在这之前，赵尚志同志在汤原召开了以北满抗日武装力量为主的大联合会议。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各地抗日部队代表一百余人、抗日民众团体代表七十余人，在黑龙江汤原召开东北抗联军政扩大联席会议。为防止日伪破坏，赵尚志、夏云杰抽调精锐部队保卫大会。日伪探得消息，由南次郎亲率队伍出征，并出动飞机，沿松花江流域，向下江一带搜索。抗联遣骑兵两支，分两路诱敌于松花江南岸，转移敌人目标，保证大会安然开成。大会通过了《抗日联军政治纲领》，共计十二条，号召东北各界爱国同胞，不分民族、职业和阶级出身、政治党派以及宗教信仰，都要参加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救国斗争，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等等。进一步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路线。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以来，抗日联军在日军和伪军的不断“讨伐”中，日益成长壮大，不仅已成立的七个军分别增编了一些师团，还先后成立了第八、九、十、十一各军。土龙山暴动农民武装几经挫折，最后在中国共产党吉东和北满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强了该军的政治与军事领导，逐渐恢复发展，改编为抗联第八军，设三个师，军长谢文东，刘曙华同志代表党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李杜残部一个团，团长李华堂在松花江下游得抗联三军

与五军的支持，后正式改为抗联第九军，李任军长<sup>①</sup>，李熙山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活跃在拉滨线上最大的“双龙”反日山林队，在中国共产党吉东党组织的关怀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宣布取消山头，正式建立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sup>②</sup>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的队伍，当初受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影响，由在驼腰子金矿当过工人的祁致中组织起反日山林队，报山头“明山”，桦川、富锦一带也有不少农民参加。该队成分纯、政治思想基础好，六军、三军和汤原县委党组织帮助他们不断改造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队伍越来越扩大。一九三六年春到勃利，改编为抗联一个独立师，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富锦正式成立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同志任军长。

抗日联军统一建制组成上述十一个军，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部 队 别	人 数	备 注
第一军	2,500人	周保中统计为6,500人
第二军	2,000人	周保中统计为5,500人
第三军	6,000人	周保中统计为5,500人
第四军	2,000人	周保中统计为2,500人
第五军	5,000人	
第六军	4,500人	
第七军	1,800人	周保中统计为5,000人
第八军	3,500人	
第九军	2,500人	
第十军	1,000人	
第十一军	2,500人	

① 李华堂在1938年2月攻方正县陈家亮子时负伤，在西风沟养伤时，被日伪掠去，屈膝投降。1945年末，在依兰方正间为国民党地下军“司令”，1946年被我军消灭。

② 汪雅臣系非党人士，能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1939年1月在舒兰县冲河山区英勇战死。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及活动区域一览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军别与负责人	编 制	游 击 活 动 区 域
抗联第一军 军 长 杨靖宇 政 委	第一师	抚松、濛江、长白、临江、柳河、 金川、通化、桓仁、辑安、兴京
	第二师	桦甸、抚松、敦化、额穆
抗联第二军 军 长 王德泰 政 委 魏拯民	第一师	桦甸、抚松、长白、敦化、额穆
	第二师	敦化、安图、抚松、桦甸、宁安
抗联第三军 军 长 赵尚志 政 治 部 主 任 冯仲云	第一师	延寿、方正
	第二师	滨县
	第三师	五常
	第四师	勃利、密山、虎林
	第五师	依兰
抗联第四军 军 长 李延禄 政 治 部 主 任 黄玉清	第一师	勃利、密山
	第二师	虎林、饶河
抗联第五军 军 长 周保中 政 治 部 主 任 宋一夫	第一师	宁安、东宁、穆稜、桦川、富锦
	第二师	宁安、东宁、穆稜、桦川、富锦
抗联第六军 军 长 夏云杰 政 治 部 主 任 张寿箬	第一师、第二师	汤原、萝北、桦川、太平川
	第三师、第四师	
抗联第七军 军 长 李学福	第一师、第二师 第三师	虎林、密山、宝清、富锦、同 江、抚远

续表

军别与负责人	编 制	游 击 活 动 区 域
抗联第八军 军 长 谢文东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第一师、第二师 第三师	五常、勃利、桦川
抗联第九军 军 长 李华堂		依兰
抗联第十军 军 长 汪雅臣		滨县、拉林
抗联第十一军 军 长 祁致中		勃利、富锦

史上鼎盛时期。据约略统计，截至一九三七年夏，抗联总数在三万五千人左右，最多时达四万五千人。

此外，还有抗联一军同盟部队王凤阁救国军一千人，祁永全部三千人，李洪滨部一千人；参加吉东同盟部队姚振山部一千人，救世军王荫武一千人等，编制不在抗联之内，但接受统一指挥的武装约一万人左右。部队的装备也大大改善，从敌人手中夺得的大部分为精良武器，平均每连有轻机枪三、四挺，还有相当数目的掷弹筒、重机枪、步兵炮、狙击炮、迫击炮。骑兵部队除一、二两军外，其它各军平均约占全员三分之一。当时在辽、吉、黑三省民间广泛地流行着这样一支歌曲：“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再遭破坏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东北不再重建满洲省委，而改建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并相应地将抗联进行整编，改为三个

路军，由各省委分片领导各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魏拯民同志率队伍来到通化、柳河、濛江、金川交界的回头沟一带，会见了杨靖宇同志，并在金川县河里召开东、南满党和第一、二军的联席高干会议，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组为南满省委，一、二军配合作战，游击地区西起辽沈，南达安东，北至长图路，东到鸭绿江地区，约三十余县。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一、二军在集安老爷岭集会，正式成立抗联一路军。杨靖宇同志任总指挥，通化地区、吉海铁路及安奉路的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都参加了一路军。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依兰县牡丹江四道河子召开的吉东省委会上决定，以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编成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此外还有一些反日山林队和救国军残余，不固定的接受二路军领导，周保中同志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第二路军的游击区，包括中东铁路哈绥线两侧、拉滨铁路以东，沿牡丹江整个流域及方正以下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右岸约二十余县。

一九三五年末至一九三六年初，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党委在汤原汤旺河建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抗联三、六两军及松花江两岸的抗联其它部队。后来，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会发出通告，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赵尚志同志任总指挥（后又改由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第三路军下辖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各军。游击活动区域沿松花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两侧和黑龙江右岸，远至黑龙江省平原，跨过中东铁路哈满线到达嫩江下游三肇地区，共三十余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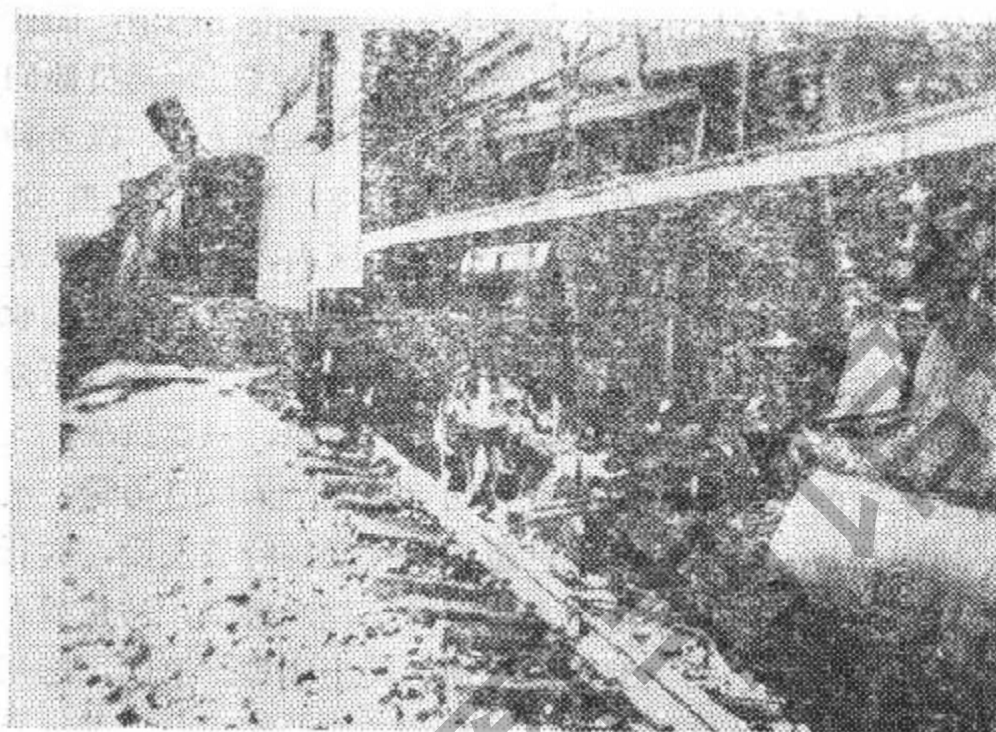
东北抗日联军所以能如此迅猛地发展壮大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最根本的就在于，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战士多数是农民，也有一些工人、小手工业者、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做骨干。它不仅完全反映



了东北父老同胞誓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昂爱国热情，而且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民族恨，动员他们参加各种反日会。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情绪越加激奋，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援抗联。抗联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并时刻关心群众切身利益要求，在游击区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严惩为非作歹的汉奸贪官，并把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第二，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日力量，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第三，注意思想教育。发扬阶级友爱，实行军事民主，严密组织机构，注意肃清内奸，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从内部进行收买破坏。如二军清除反动的民生团等。第四，运用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一反过去东北军或是占据地盘、死守一方，或是插枪不干、解散队伍，或是跑进山林、坐吃山空等错误做法，而是化整为零，避免打硬仗，尽量袭击敌人的守备所、警务所，破坏敌人经济中心地区及交通要道，夺取敌人武器给养以武装自己。不死守一地，从斗争需要出发，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带，如通化（即所谓东边道）、延边、吉林东部、兴安岭区域以及松花江下游等。这些地方有长白山、兴安岭可以掩蔽，也有起伏的丘陵和滔滔的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等形成天然的屏障，致使日本现代化武器如飞机、大炮等无法发挥威力。

### 3 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一九三七年前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燃遍了东北大部地区。南满第一军攻占磐石，袭击清源，巧取三源浦、八道江、凉水泉子等地。一九三六年破关东军和伪靖安军李寿山的联



被抗联三军颠覆的敌人的火车

合“讨伐”。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反“讨伐”中，歼灭伪军邵本良旅和伪蒙军“索旅”，在震动全满的摩天岭一役中，全歼日军今田大队千余人，缴获火炮七、八门。此外还进出于安奉铁路沿线和鸭绿江沿岸，攻破了几千个小城镇，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北满抗联三、六军攻占方正县、宾县，袭击汤原，攻陷萝北、佛山，日伪遍布松花江右岸铁骊、庆城、东兴、凤山、巴彦、通河地区的许多据点，均被三、六军一一拔除。远至乌苏里江右岸的东安镇和独木河之敌人也常遭受袭击。战斗在吉东牡丹江以南一带的二路军，在敦化寒葱岭打伏击，猛攻抚松城，夜袭前刁岭，攻克安图、依兰，打了一连串的胜仗。

日伪拼命要修筑的京图、图佳、林虎、绥佳等铁路线，在我抗联的不断打击下，其筑路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修筑绥芬河的

“国防”公路计划，在连遭我抗联五次打击之后，宣告彻底破产。一些孤立的伪军据点，也经常被袭击，再加上抗联进行政治攻心的抗日宣传和执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致使伪军普遍动摇，成连、成营暴动起义投向抗联。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消极观望，与抗联交锋时，枪口朝天放，甚至还有借机枪给抗联打日军的。藤井、李寿山率领的伪“靖安军”（因袖口上饰有红道，抗联称为红袖头）在日本侵略者眼中被认为是最有战斗力的，但经过抗联一军、五军等的几次打击，已溃不成军，在调往吉东的过程中，一大批人哗变，杀死日本指导官，反正后投向抗联。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内，“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了，许多地方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吉东、南满、北满一些县成立了人民政府，与日伪政权相对峙。特别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敌军。尤其是在依兰、桦川、勃利一带，成了抗联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军的集合地区，各军上下左右驰骋，灵活机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当地的农村城镇，完全掌握在抗联与抗日救国会的手中，敌人所能控制的只是比较大的城市和分散孤立的据点而已。座落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是伪三江省的中心，更是抗联六军的故乡，他们是汤原的人民子弟兵，差不多家家都有人参军。抗联部队要打日军，群众都自动报名前来参战，组成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炮，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的人手里提着汽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打仗时，把炮放在筒里，响起来比重机枪还厉害，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妇女会、儿童团、救国会也都出动了，或在路旁摆上茶水劳军，或准备担架抢救伤员，或赶着大车去拉战利品，……难怪日伪军无可

奈何地叫喊：“汤原的地皮红透了三尺。”敌人费尽心机，也没有把这个县伪化，由于党在这一带群众基础好，大打人民战争，对敌斗争活跃，不仅乡村大都被抗联控制着，就连汤原城里和敌人控制极严的有数的几个据点里，都有抗联的内线，三、五个特务汉奸，根本不敢出来活动。此外，在三军出没的滨绥铁路两侧的哈东游击区里，还有由农民选举产生、党领导的地方政权——农民委员会。广大农民亲切地称呼县农民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我们的县长”。由于建立了农民的政权，有的还打击了汉奸地主，搞了吃大户等，这样一来，农村既受不到日伪特务警察的欺压和逼索，而土豪劣绅、土匪地痞的剥削掠夺也大为收敛。在吉东、东满一带，有些地方的妇女会、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救国会负责为抗联筹划给养，供给粮食与衣物。几乎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救国会。

抗联第一军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不过五年的时光，到一九三七年时已扩大了二十倍，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九三九年五月先后四次与抗联二军会合，这种大会师不仅在军事上能统一部署，协同作战，而且还交流了斗争经验，更把东满、南满游击区联成了一片，迂回从容，纵横作战，扰得日伪不得安宁，闻风丧胆，把东边道一带称为“满洲之癌”。<sup>①</sup>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打击敌人，扩大抗联的声势，一九三七年，杨靖宇开始组织一军西征，准备与挺进到热河一带的八路军打通联系，建立热、辽、吉、黑游击区，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结束关内外相互隔绝的局面，两次西征虽没成功，但却显示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声威，挫伤了敌人的锐气，箝制敌人兵力，

<sup>①</sup> 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402页。

使其不能入关南下，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配合关内部队抗战的作用。在东北战场上，抗联五军曾派独立旅远征南满，从依兰的大小罗勒密出发到敦化、额穆、蛟河、桦甸、濛江、辑安各地，建立了南北满联合战线。一九三七年，他们又派兵沿牡丹江流域北上，一直扩张到穆稜、勃利、密山一带，与抗联四军汇合。又向北过了依兰、桦川，与三军汇合。以后向东发展，到宝清等地又与七军联络到一起。这样，从南满到北满以至东满山地的抗日联军全都联络与汇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铁拳。

一九三六年，抗联的武装斗争达到最高潮。包括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大量的城镇和设施，频繁遭到抗联的袭击。如满铁铁路总局报称：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以来，抗联“行动异常活跃”，“经常接近铁路沿线，给我方以莫大威胁。”五月份，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出现次数为七百八十六次，总人次共达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名。”<sup>①</sup>七月份抗联与日伪军交战次数更多。据当时华联社长春电讯称，七月份内，抗日联军出动二十万人次，而日伪军才六万人次。这一个月内，敌人死伤达九百余人。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以前，东满一带各铁路夜间一直不敢行车。但由于日伪军警的极力围剿，抗联也不断受到巨大损失，但战斗始终没有停止。直到一九四〇年仍在英勇战斗，据伪第四军管区一九四〇年春天的公报说，“三江省一地，抗联主力部队有三万两千人，一年来（指一九三九年）与我作战二二〇次，我方死伤一千四百六十人。”<sup>②</sup>

① 满铁铁路总局：《月报》1936年5月，秘，第1—3页。

② 李杜、周保中等著：《东北的黑暗与光明》第42—43页，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版。

#### 4 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

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与侵略计划已构成严重威胁，成了“心腹之患”。因此，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妄图全部消灭之。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加强关东军的兵力，至一九三六年初，日军竟增加到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一个专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的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的兵力。敌人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篦梳式”、“踩踏式”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抗日群众。进攻的重点由南满、东满、吉东后发展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一带。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关东军动用四个师团以上兵力，实行了所谓在军事上、政治（招降）上、经济（断绝给养来源）上全面的“三江省大扫荡”。一九三八年十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以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的兵力，在全东北集中搞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的“大讨伐”。与此同时，还拼命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埋藏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更在全东北实行所谓“大检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被逮捕、拷打和杀害。还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抗联部队和广大爱国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但终因敌强我弱，特别是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斗争日趋尖锐化，抗联开始进入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全党独立自主，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给东北抗联及全体同胞电

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对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专门给以杨靖宇同志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全体东北同胞拍了慰问电。电报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陷于敌手的东北人民和与敌苦斗的东北抗联在政治上的关怀，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在日伪的严密封锁与疯狂进攻下，抗日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也屡遭挫折。东北抗联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防御的，而战术却是积极进攻的，因而越到后来，承受的军事压力越大。当时的情况是，第二路军逐渐向哈东旧区活动，以免陷入日伪在伪三江省搞“聚而歼之”的圈套里去。第一路军围绕长白山西南、西北两侧活动，还几次试探，插入辽西，终因过不去辽河，西征的计划遭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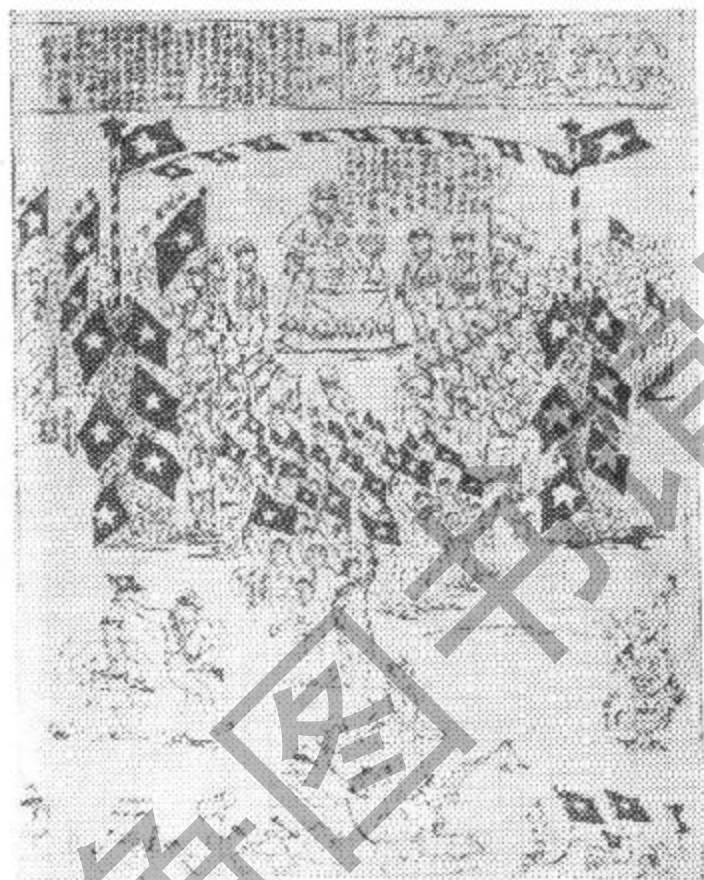


抗联印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报告

碍。战斗在延边的抗联第二军，外受日伪军事进攻，内受在处理“民生团”叛变分子斗争中“左”倾错误的影响，不得不撤离延边。原打算把东南满连成一片，创造根据地的设想，也不能实现了。杨靖宇部队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游击区，向东部山林撤退。其它各军也都同样逐渐失去了游击区，被迫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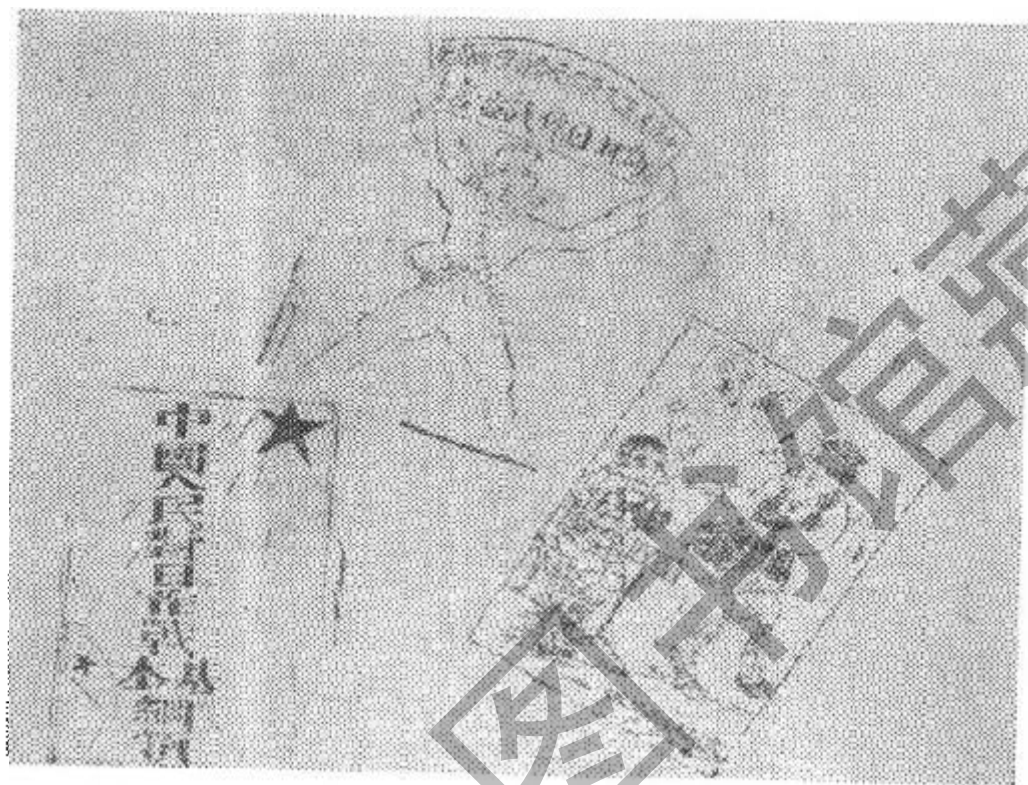
本来，抗联曾利用东北绵延起伏的山地，修建了许多密营，有被服厂、野战医院、兵工厂、修械所、印刷厂、军事政治学校以及军需仓库，储藏粮食、武器、弹药、被服等，由于日伪搞“铁壁合围”、“蓖梳山林”，再加上叛徒告密，许多密营被捣毁了，而





抗联出版的《人民革命画报》

冬季气候严寒，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衣少粮，又无落脚休整的地方。这是东北抗联最为艰苦的时期。露营生活正象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战士还穿着单衣；没有棉帽，只好围条毛巾；耳朵冻出水；脸颊冻破，鲜血直流；脚上有的穿着破胶鞋，有的没鞋，干脆用麻袋片包着脚行军走路。李兆麟同志所写的《露营歌》，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一年四季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吃的经常是苞米粒和带壳



### 抗联的出版物

的麦子，好一点的有炒面，经常没有粮食吃。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棉絮、破靴鞋底都成了最好的食物。医药，更是奇缺，战士们作战负了伤，连一条药布绷带也没有，只好从身上撕下一片衣裳，包扎起来继续战斗。更为恶劣的是，日伪军经常在“讨伐”时，到处纵放山火，施放毒药。同时，还无耻地把女人画片、女人服装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食和“亲慰书”、“招降书”，妄图从精神上瓦解、动摇抗日联军。然而，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献身的抗联战士，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任凭什么也动摇不了的。战士们坚定地表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摧。他们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豪迈地唱道：

“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熄烽烟。”

“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山。”

抗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喋血苦斗，展开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不仅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也揭开了近代世界史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斗争最精彩的一幕。

有名的“八女投江”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参加二路军西征的女战士有教导员冷云、班长胡桂之、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等八人，在阴历九月初的一天，越过几道封锁线，来到牡丹江畔，露宿在乌斯浑河尽头柞木岗山下，准备过河去克上克密营五军军部。敌人发现后，从三面包围上来，她们几次突围冲不出去。敌人看其人少力单，又多是短枪，疯狂叫喊：“投降”，“抓活的”！八位英雄的姐妹，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持革命气节，从容地架起负伤的战友，决然跳进乌斯浑河。秋天河水泛涨，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她们昂头挺胸，用坚强不屈的身躯，推着汹涌的河水……岸上的敌人被眼前这慷慨就义的景象惊呆了。

宝清十二烈士的苦战，与“八女投江”一样动人心魄。一九三八年年初，抗联五军三师七团一连奉命驻守在距五军密营三十多里的尖山子南侧山坡上警戒敌人，这是五军的头道卡子，地势险要，为人山必经之路。连长李海峰<sup>①</sup>，指导员朱志新、班路遗，战士张凤扬、魏锡林等十四名都是神枪手，故该连被称为“炮手连”，不过他们的装备很差，除一挺捷克机枪，两支短枪，其余为连珠步枪，弹药也不足。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敌人来攻时，他

<sup>①</sup> 又有记载为李海山。

们固守在谷地平原里一座小孤山上。早七时，战斗打响了。李海峰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要节省子弹，剩下一人一弹，也不叫敌人捉活的！”第一批有百余名敌人，分东西、南北两路骑马往上冲，不到二十分钟，被打得人仰马翻。敌人只好放弃了抓活的打算，开始用炮轰，组织几次大冲锋，都被抗联战士猛烈的火力打了下去。待敌人发动第五次冲锋时，天已经黑了，敌人再次强攻。山上只剩下李连长和五名战士，都是带着重伤，连长腿打断了，战士们抬着他，坚持战斗。子弹全光了，李连长手持空枪筒对敌人大喊：“你来，来我就给你这一下子！”敌人慌忙扔了几颗手榴弹，连长李海峰和三名战士壮烈牺牲。其余两名战士抱枪从山上就雪滑到山下，隐蔽起来。敌人半天不见山上有动静，才胆颤心惊地摸上山，只见遗体，不见武器。这次战斗，抗联这支小部队所带弹药二千余粒，却击毙了日军二十五名，重伤十余名，兴安军被击毙七十余人，伤十五人，冻伤日伪军近五十名，军马被打死九十余匹。军党委决定，为永志不忘，把小孤山改为烈士山。

在抗联苦战恶斗、可歌可泣的壮举中，不仅有上述这样的集体英雄群像，也有象少年铁血队的姜墨林和老交通员李升这样的英雄个人典型。

姜墨林是宁安县红土墙人，他的家乡正是党所领导的绥宁游击队最活跃的游击区。一九三二年，姜墨林才十一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做交通联络工作。他不断出入于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往来传递信件，历经风险从不误事。他经常穿着破棉袄，脚穿发臭的胶皮鞋，头顶破帽子——重要的信件就藏在这里，扮成个流浪儿，扔着石头，打打闹闹的，以小孩子顽皮的假象，混过敌人的眼目。在战场上，他却是个勇敢的战士。抗联五军在延吉双河镇痛歼日伪军时，东关据点是核心，姜墨林率领小队战士，冒着风雪冲进据点的地堡，用一捆手榴弹堵住了机

枪眼。一九四三年，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姜墨林率领小分队，单独活动，袭扰敌人，坚持战斗。最后，在东宁西八道河子被敌人四面包围，为了掩护同志突围，他孤身一人与数倍于己的敌伪相拼，最后壮烈牺牲。敌人翻拣他的遗体，发现用红铅笔写的标语：“中国必兴，日寇必亡。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救国胜利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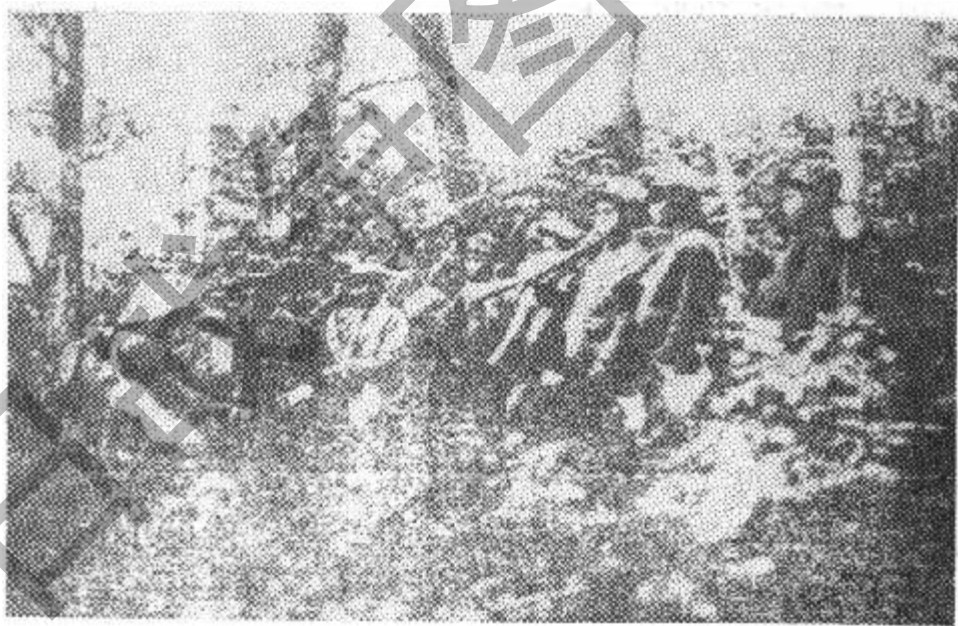
抗联的老交通员共产党员李升同志已七十多岁了，拼着老命为抗联做事。他以父子、父女或父媳等关系，冲破日伪警宪的严密盘查，掩护和护送过杨靖宇、魏拯民、冯仲云、赵一曼、李兆麟等抗联主要领导人。他非常风趣，十分机智，总是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种联络任务。抗日的烈火在东北各地越燃越旺，老李升的踪迹也就在各个地方频频出现，他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愉快和兴奋，胜利的消息通过他，在各军之间传播着。为了联络战斗在长白山密林中的抗联一军，一九四〇年冬，他在长白山麓踏着深雪，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军的密营，打通了抗联各军之间的联系。后来，李升在依兰被捕了，敌人用掺着辣椒面子的煤油灌他，用烧红的烙铁烙，用钳子拔胡须，带血的皮一块块地被撕下来。这位钢铁老人就是什么也不说。没办法，敌人搬来铁蒺藜编的笼子，把李升放在这个里外四面都是刺的笼子里到处滚动。老李父亲遍体被扎上了窟窿，浑身是血。他痛昏过去了，但仍咬紧牙关，一句不说。就这样，他还捎信说，“告诉队上的弟兄们，好好打日本鬼子，多多消灭他们！”

在与日军浴血苦斗十四年的抗联队伍里，何止几个姜墨林、李升，而是成千上万！至于八女投江与十二烈士山的英雄业绩，也是不胜枚举的，他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东北抗联这样顽强地坚持斗争呢？那就是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他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坚信

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沦入敌手的东北河山一定能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①</sup>东北抗日联军所以能这样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甚至在深山密林里仍能继续坚持战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奋不顾身，竭尽全力支持的结果。在抗日游击区，有的老乡把自己家仅有的几升新米拿出来献给抗联，有的姑娘媳妇把自己千针纳、万线缝的鞋送给战士，还有的老猎人，把伴随自己多年的双筒围枪捐给游击队，不少年青力壮的男女青年和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员要求参军参战。敌人来讨伐，传递情报的鸡毛信，早把消息送给了部队；敌人来封山，群众早把粮食、土豆、黄豆埋在雪地里保存起来，由那些猎人、炮手想方设法背到山上，逢到过春节，老



人民群众给抗联送情报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

乡亲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抗联送些东西以表心意。抗联一路军陈翰章的部队，有一年旧历年底在宁安县南卧龙河一带活动，当地抗日救国会的干部决定要在过旧历年时包顿饺子慰问战士。当时日伪在这一带村子里，已经实行了“十家连坐”，大米白面严加控制。但是群众不管这些，在腊月二十三这天夜里，宁安南新官地、葡萄沟、卧龙河三个村子共五、六百户人家，家家动手包饺子，一夜功夫就包好了。他们把包起来的饺子放在外面冻硬了，然后偷偷集中起来，用面袋把饺子装起来。为掩人耳目，又用大麻袋套起来，中间塞上马草，放上爬犁又盖满谷草，蒙骗了敌人的耳目，把“抗联的饺子”顺利地送到了战士手中。为了支援抗联，多少群众冒着风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与严密控制，给部队送信、送粮、送衣。

一九三九年冬在严重的斗争关头，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负责同志集会讨论，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的方针，并重新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将三个路军的各军整编为十二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伪强敌进行殊死的斗争。第一路军缩编为一、四、七共三个支队，第二路军缩编为二、五、八等三个支队，第三路军各军编三、六、九、十二共四个支队。部队经过缩编之后，人员虽比过去减少了，但情绪稳固，思想坚定，组织纪律更加严明。在游击战争中，采取高速度运动和远距离游走，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接触，以防被围攻、追逐。特别是在有利于敌人活动的冰雪季节，尽量少与敌接触。此外，在条件有利、不易为敌人侦察发觉的林区，各部队派出相当人员，散种农作物，为自己准备必需的给养，以打破日伪的封锁。在春夏之交，特别是夏季青纱帐起的有利时节，抗联各支队迅速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敌人。一九四〇年一年，抗联就这样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紧张而又机敏地进行着东北各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期间，黑

龙江省平原的游击活动曾有较大的开展。

一九四一年初，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同志再度集会，又一次分析估计了全国的形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展望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前景，提出了在东北坚持长期斗争的问题，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义”，明确提出“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sup>①</sup>并于一九四二年初，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将三个省委合并为一个“东北党委会”。在东北党委统一领导下，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了十五支小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小部队人数不多，平均由十五人至二十人组成，队长和政委都是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都是选拔过的优秀同志。这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党委会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下，分遣于北满地区有四，吉东和延边者八，吉辽边区者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抗日武装。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处于低潮，进入了一个暂遭挫败的阶段，但并不象日伪自欺欺人所宣传的那样，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这块被蹂躏被奴役的土地上燃烧，一些孤立的据点常被伏击。在伪北安省区，伪吉林省区，被抗联小部队袭击据点的事屡屡发生。伪三江省区密山、宝清、佳木斯间的交通运输线也常被抗联小部队截击。一九四三年十月末，哈绥线也河站南沟的日军据点屡遭袭击，其中有一次，二十余名日军全被歼灭。该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伏击追兵又消灭敌人百余人。在群众掩护下，破坏铁路运输事件也屡见不

<sup>①</sup> 周保中《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草稿)。



鲜。如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凌晨一时，在哈尔滨郊外滨洲线庙台于站西六公里，大榆树信号所附近的铁路拐弯处被拔去道钉十五个，拿掉两块铁板，造成哈尔滨发到满洲里的军用货车颠覆。在抗联小部队的宣传影响下，伪军也日趋觉醒，开始起来抗日。在富锦东北五顶山曾发生一件十分悲壮的事情。五顶山是屹立在三江平原上的险峰，日本侵略者准备做为对苏作战的支撑点，全山要塞化。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军事部顾问楠本十龙中将前来视察，在山顶受检阅的伪军部队中，突然冲出一名士兵，持手枪面向他们开枪射击后逃走，第二天被追赶至江边跳江自杀。<sup>①</sup>临近日伪垮台前夕，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江省通河县警务科，为摧毁当地秘密的抗日救国会组织，逮捕数百人。四月六日，伪警察队小队长王明山在抗联的影响下宣布起义，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袭击了警务科，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吓得伪三江省警务厅派出救援部队前往镇压，甚至出动了飞机，成为轰动一时的通河事件。<sup>②</sup>不仅在北满一带扰袭日伪，在吉辽边区、伪通化省区，抗联小部队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也有不少袭击活动。至于在吉奉铁路沿线和拉滨沿线，以抗联名义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也时有所闻。而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如伪都新京、沈阳、大连、哈尔滨以及阜新，抚顺、本溪等地，受中国共产党和抗联的领导和影响，怠工、罢工事件层出不穷。集中营集体反抗、逃亡、暴动等等抗日的政治活动也不断发生。所有这一切对日伪统治者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抗联小部队这时人数不多，但敌人却把它与骁勇善战的抗联大部队联系在一起，在侵略者看来，“那到底曾是千军万马的强者，以他们得意

<sup>①</sup> 见《满洲国史》各论，第264页。

<sup>②</sup> 参见《满洲国史》各论，第325页。

拿手的游击战术仍在活动着。”<sup>①</sup>如果说，一九三七年高潮时是已成燎原之势的抗日烽火，现在则变成了闪着不熄亮光的火种，这火种正在酝酿和准备着再度燃起冲天烈焰的熊熊大火，最后焚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傀儡政权——满洲国。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来，是经历了从发展到高潮，又遭受挫折，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这中间有许多经验教训有待于进一步总结。

从客观上说，日本侵略者一向十分重视我国东北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农作物和地下资源，把它作为全面侵华乃至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重要基地，也是准备配合轴心国发动对苏一战的前哨阵地。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从国内抽调大批人力，进行长期的苦心经营，建立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体系，使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出现了敌强我弱的严重困难局面。这一点，越到后来，表现得越突出。从军队数量看，日军由一九三一年两个师团，一万余人的兵力，发展到一九四二年特别是四三年以后，增为二十四个师团，九个混成旅，约七十余万人，几十倍于抗联，且又拥有航空、装甲、通讯、江防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与军事给养。抗联则靠从敌人手中夺来武器弹药武装自己，最好的也只是三八式步枪，不少人还手持大刀、木枪，长矛等，军需给养全凭群众支援。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在十四年的艰苦岁月中，抗联只得到堂堂“中央政府”区区五千元的资助。

可以说，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战略形势和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是东北抗日联军遭受挫折和削弱的基本因素。另外，抗联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根本问题是党的领导不够成熟、有力，中、后期受王明等人的错误路

<sup>①</sup> 北里留：《官行采伐事业与匪贼》，见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542页。

线影响、干扰较大。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封锁，抗联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处于无法联系的长期隔绝状态，由于地理条件方便和组织领导系统的关系，不能不受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王明等人这条路线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的秘密信件和其它有关的指示信中的问题是右倾。本来，一九三五年前后，在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开始建立了比较广泛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反抗斗争正在出现新的高潮。但是王明等人却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东北极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武装起来”<sup>①</sup>。本来，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因而抗日斗争既要反对日本侵略者，同时也必须坚决地反对伪满傀儡政权。可是，王明等人却荒谬地提出“不要把反满抗日并提”，<sup>②</sup>因而模糊了斗争目标。他们还主张“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sup>③</sup>目的是为了迎接“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sup>④</sup>说穿了就是插枪不干，坐等苏联对日宣战，不相信也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积极斗争。

王明等人这些错误指示与主张，在抗联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甚至也有很激烈的斗争，影响了团结，受到了干扰，这是客观事实。由于各军情况不同，王明等人的影响所达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在中、后期，抗联有的部队在王明等人右倾保守错误方针影响下，消极等待，不积极在斗争中积蓄力量，以致部队战斗力不强，发展也十分缓慢，甚至产生取消主义的倾向，有的部队在王明等人提出的“不必固守旧游击区，而应开辟新

① 王明、××1935年6月3日秘密指示信。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1936年10月2日寄给抗联的《中央新政策路线》。

③ 同①。

④ 王明、××1935年6月3日秘密指示信。

游击区”<sup>①</sup>口号的影响下，流寇主义思想有所滋长，常常是游而不击，有时虽也打几仗，但习惯于打完就走，有的满足于凭个人威信开展工作，不是公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政权。与此同时，民族团结和反奸反特，对待地富等一系列政策也贯彻得不够好，有过火行为。面对敌人的“治安肃正”，特别是“归屯并户”制造“集团部落”等狠毒手段，没有做巧妙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拿不出有效的对策。这一切就使抗联不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结果，在敌人疯狂围剿下，不得不转向深山密林，迎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露营，实难坚持。

除了王明等人错误路线影响、干扰外，抗联领导人自身的弱点也的确存在。单纯军事观点，不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不重视地方工作和政权建设，没有切实解决群众自身的迫切要求，不注意党的政策，特别是一直存在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个别人有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中心——总司令部始终不能真正成立。尽管在协同作战等方面，较之义勇军时代已大有改进，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互不服气，甚至抢地盘，争给养，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这样，不仅不能共同作战，反而被敌人分而治之，使各部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自行苦斗。

尽管东北抗联在斗争中暴露出许多弱点，特别是由于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最后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到一九三九年时，二十三个县委只剩下十五个，属于七十二个县范围的游击区，此时也只剩下十二个，武装力量骤减到千余人。但值得赞颂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没有放弃反满抗日的旗帜，这一点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九四〇年《盛京时报》刊载敌参谋长谈话称：“共产‘匪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计划布置极有组织性，对于组织民众极有功效，是实在不可忽

<sup>①</sup> 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1936年3月12）。

视的敌人，……以现时之‘讨伐部队’尚无法摧毁。”<sup>①</sup>关东军公报二〇七期在报导军部反映时说：抗联“受共产思想的影响与日俱深，他们的活动带有执拗恶性，覆灭他们的巢窟，破坏政治匪，尤其是思想匪的组织，以期根绝匪祸，决不是容易的事情。”<sup>②</sup>

历史已经证明，东北抗联在敌后坚持了十四年的长期游击战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对于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箝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阻扰了敌人侵略计划的迅速实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酷爱独立、自由，为维护民族尊严，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与气概。“七·七”事变爆发后，抗联又从敌人背后进行侧击，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sup>③</sup>

### 三、东北抗日英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武装侵略，国民党顽

①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第68页，辽东建国书社版。

② 见《东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第42页——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袖珍一卷本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